

《晋祠》一文是我第一篇入选中学课本的文章，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初中三年上册。当年读书的孩子现在也该有50多岁了，忽然不觉已快半个世纪，他们的孩子可能也学过这篇课文了。

凡成故事都是巧合。1982年适逢改革开放初期，百废俱兴，各业复苏，教材也在重新编写。当时我在《光明日报》驻山西记者站任上。北京的地图出版社要创办一个《图苑》杂志，就请报社帮忙通过驻各地记者约一些风景名胜的稿子。我按约写了这篇《晋祠》。因为对它太熟了，并没有费多大的劲。记得是春节，正月初一上午领着孩子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给邻居们拜年，然后回到家里，大约两个小时就写完稿子，眷眷后寄走了。但是，《图苑》最终没能创办，又把稿子退回报社文艺部。报社说我们也有副刊，就在本报发吧。4月12日见报，当年就出现在课本里。如果真发到那个新办的杂志上，可能也不会引起编书人的注意。《光明日报》真是我的一块风水宝地，我前后有9篇文章入选主流教材，其中4篇来自《光明日报》。

因为上了课本，我就被误以为是个老人。其实那一年我才36岁。“文革”十年断档，当时这个年龄在学界算是很年轻的。两年后我考上中央党校的研究生，同班有一位县长，假期回家看见儿子正在读这篇课文，就说：“好好学，作者是我同学。”没想到儿子仰起头看了他足有好几秒钟，突然说：“这个人早死了吧？”确实课文里的古人、死人太多。我偶尔收到读者来信也常被称作“老先生”。当时《人民日报》办的《新闻战线》向我约稿，却把稿子发在“与青年记者谈心”栏目里。18年后我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，正好分管这个杂志，他们一见这个当年的“老人”就哈哈大笑。在报社值夜班等稿子是最枯燥的时刻，大家就聊起当年怎样被老师逼着背课文《晋祠》，十分亲切。

后来我也写过不少文章，但再没有像写《晋祠》那样轻松。有的文章要写几年、十几年。现在想来，是因为我对晋祠太熟悉。我的小学、中学阶段在太原度过，那时学校组织春游首选晋祠，已记不清去过了多少次。在一个少年眼中，周柏、唐槐这些苍老的大树，穿过千年留存下来的宫殿、木雕、泥塑、铁人等文物，有一种悠远、神秘、瑰丽的感觉。另外，走出四壁合围的教室，吹一吹田野的春风，心情豁然开朗。我现在还记得，春游归来的人们自行车上插一束山花，车铃叮当，一条花的河流。这就是我在文中的那句：“春日黄花满山，径幽而香远。”还有那光着

人与文章一起老

课文忆写之四：《晋祠》



左图：收有《晋祠》的语文课本。

右图：《晋祠》手稿。

下图：1982年《晋祠》入选课本后，梁衡（中）与中学师生见面。



头捧钵接水的小和尚、深水下根根可见的水草，永生难忘。

历史的浑厚加煦的春风，一种说不出的美感抓挠着一个少年的心，悄悄地埋下了一颗文化的种子。有一种观点，说一个人在四岁以前吃的什么，就决定了他的味蕾，一生都忘不了这种味道。所以人总是怀念童年的饭食。精神之餐也是这样，孩童时期的美育教育特别重要。听说现在为了安全，有些学校早已不组织学生春游了，这实在是一大损失，当一株幼苗正需要那一缕阳光时，却被悄悄抹去。

晋祠，我后来还是常去，有一次是帮助收割稻子，住在农民家里。晋祠的水好，产莲藕；大米也好，为历代的贡米。在地里干完活回来饿

极，两脚污泥，先吃一包荷叶饭，畅快无比。我结婚后和妻子的第一次出游，就是蹬着自行车去逛晋祠。后来省里的“五七干校”办在邻县，每周回城一次都要路过晋祠。可以说晋祠已融化在我的血液里。

那次能很快交稿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写作的心态放松。如果当时知道在给教科书投稿，是绝对写不出来的。艺术，包括写作艺术，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有最好的发挥：一是纯自然状态，不知高低，所以摄影要抓拍，画家要画模特儿；二是对艺术规律已经纯熟到自由的程度，但要做到这一点很难。所以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二者之间徘徊，未臻最佳。那篇《晋祠》属初生牛犊，以后再写

章反而左右拿捏，愈写愈胆小。写作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，至于入选课文更是天时地利的巧合。后来我又写过不少地方的风景，当地人也总想入选课本，为地方做广告。我只好笑一笑，无法解释。

晋祠是一处名胜，但在它名下有三块牌子。它首先是一处古迹，保存有唐宋以来的许多文物，是一座开放式的露天博物馆，并专设有文物管理所；因为山水秀丽，建筑奇特，它又是一座大公园，接待社会游客；它还是一座国宾馆，类似北京的钓鱼台。所以我那一篇文章，可谓一石三鸟，与这三家都有点关系。多少年后我出差太原，晋祠文管所所长盛情邀我重访故地，原来他中学时在

课堂上学过《晋祠》，大学毕业后当语文老师又教了多年《晋祠》，再后来进入文管行业最终当了晋祠文管所所长。那天他送了我一张珍贵的唐太宗亲书《晋祠铭》拓片，李渊父子是从晋祠起家奠定大唐的。他说《晋祠》入课文，大大延续了这一脉文化的香火。我退休后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被编入山西团，团里有一位代表是晋祠宾馆的主任，他说一个宾馆能上课文全国没有，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在宾馆院里用石头雕刻了一本大书，上面刻着这篇《晋祠》。当然最得实惠的还是晋祠公园，50多年来不知因这篇课文引来多少游客，许多当年的学生早已成年，假日带着孩子自驾游，去晋祠找感觉。而高考时，竟有不少外地中学生因晋祠的迷人风景而报考太原的院校，毕业后就留在了山西，还促成了人才流动。这有点像当年电影《五朵金花》放映后，许多青年报名去云南。

2015年全国书市在太原举行，在晋祠宾馆我遇见了时任太原市市长耿彦波，他痴迷文化遗产，是个文化基建狂魔，山西的许多民间大院都是他挖掘整理出来的。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在开发王家大院，第二次见面时他在开发常家大院，第三次见面时他已是大同市市长，正在恢复大同的古城墙，还在城墙内建了一座“梁思成纪念馆”。我为此还写了一篇《梁思成落户大同》。这次见面时他说正考虑在晋祠公园立一块《晋祠》碑。2019年这块碑落成，碑很考究，是委托故宫用汉白玉刻制的。主持此事的市文物局局长，在这之前曾当了多年的教育局局长，他说自己的工作换来换去还是脱不了与《晋祠》的缘分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黄社长与我母校的冯校长应邀参加剪彩。屈指一算，黄社长已是《晋祠》入选课文之后的第三任社长，而冯校长则是我高中毕业那一年才出生的。我这回确实是一个“老头”了。在场的很多游客看到课本里的《晋祠》上了碑，主动围过来参加揭幕，他们有老有小，都是当年被教师逼着背书的学生，今天却兴奋不已。

揭开红绸，我转身看着巍峨的晋祠大殿，黄绿琉璃瓦的飞檐在蔚蓝的天空下十分耀眼。我突然记起梁思成在回忆录里写到，20世纪30年代他和林徽因来山西考察古建。原来的考察名单里没有晋祠，但当长途汽车驶过的一刹那，隔着滚滚烟尘，他看了一眼这个大殿的一角，就猛然心动不止。一个月后他又返回这里作了专题考察，发现了全国唯一的十字飞梁和一系列的古建原物，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精美的绘图。

李白当年也是到过晋祠的，他曾有一句话：“光明者，百代之过客也。”人总是会老的，我们都是过客，只有晋祠和它的山、水、树，还在与后人一代一代地对话。

涌起的时候，泛起的泡沫，却自以为是雪花。

日子过得飞快。从20世纪90年代初，转眼到了2021年，过去了30年。如果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做那个大衣柜的时候算起，已经过去了44年。我从尚未结婚，一下子变成两鬓苍苍。

一年多前的夏天，在龙潭湖公园里，遇见一帮北大荒的荒友正在湖边翩翩起舞，准备知青会表演的节目。在那一群荒友中，见到了当年在花市玻璃店卖玻璃的女知青，聊起天来，我说到当年买大衣柜玻璃的往事，对大家开玩笑说：“我们家大衣柜的镜子，一直等着她卖我呢，她可倒好，一直也没理我。我们家的大衣柜就一直没有装上玻璃！”她笑着反唇相讥：“你倒怪我了！玻璃就在那儿放着，你不来买，那么大一块玻璃，还让我给你扛回去怎么着？哪有这么求人办事的，倒像我欠你的了！大衣柜的玻璃，落下话把儿了！”大家听了都呵呵笑起来。

其实，我就是拿她打镲。她说的没错，这事不能怪她。我早想明白了，也是我懒，大衣柜两米多高，镜子最起码得用一米五六长，到她那儿去购买，买了扛回家难，便让我一拖再拖。等这块大衣柜的镜子，像“等待戈多”了。很多年轻时候的事情，苦痛也成了今天的欢乐回忆；彼此的隔膜，当时系成的疙瘩，现在也像是系上的蝴蝶结了。

有意思的是，曾经大衣柜玻璃的替身——那块花布还在。年前收拾旧物时，看见它成了一块包袱皮，包裹着几件早就不穿又没有丢掉的旧衣服。花布上曾经鲜艳的花色已经掉色，如同花枝干枯的标本，花样年华只留在记忆里。看见这块褪色的旧花布，想起了它多年前替代大衣柜玻璃的同时，也想起了当年北大荒劝我不要锯断黄波椤的木匠，想起用黄波椤为我打大衣柜的木匠，当然，也想起了玻璃店这位好心的荒友。

忽然，想起曾经读过的前辈沈祖棻教授写的一联诗：“遥想詹桥今夜月，梦中归路几人同。”四十多年过去了，真成了遥想，遥想着这块花布垂挂在大衣柜上的样子，特别是在有微风有月亮的夜晚，随风摇曳的样子，月光打在它上面暗影浮动的样子，辉映着黄波椤木的大衣柜，辉映着整个洋桥小屋，是那样的明丽、生动，又有几丝温馨。青春虽然在这里消逝，儿子却在这里长大，我在这里复习功课，“二进宫”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。艰苦的日子，月光如水，一下子明亮了起来。

遥想洋桥今夜月

曾经读过前辈沈祖棻教授写的一联诗：“遥想詹桥今夜月，梦中归路几人同。”四十多年过去了，真成了遥想，遥想着这块花布垂挂在大衣柜上的样子，特别是在有微风有月亮的夜晚，随风摇曳的样子，月光打在它上面暗影浮动的样子，辉映着黄波椤木的大衣柜，辉映着整个洋桥小屋，是那样的明丽、生动，又有几丝温馨。青春虽然在这里消逝，儿子却在这里长大，我在这里复习功课，“二进宫”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。艰苦的日子，月光如水，一下子明亮了起来

我告诉他是从北大荒带回来的。他叹了口气说：怪不得呢，只有北大荒的老林子有这么好的木料，北京城，难找！

最后，他问我：这么多木料，你就打一个大衣柜？不可惜了？我便对他说：再打个写字台，木料够吗？“没问题！”他答道，便开始在我家干活儿。那时，洋桥的地铁宿舍每户都有一个小院，他干活儿的场地方足宽敞，很容易要手艺。中午饭在我这里吃，一早一晚，他都回住地自己吃。他不挑食，我母亲做什么他就吃什么；住得不算远，来往还算方便。每天小院里多了锯刨木头的声音，纷纷落地的锯末和刨花，散发着木头的清香。

下班后，有时我会帮他打打下手，彼此熟络起来，他曾经对我说：这可都是好木料，这样的黄波椤，现在是用材料，做枪托用呢，又坚实又软，有韧性。他还对我说：我做了这么多年木匠，第一次用黄波椤打家具，我可得好好给你打个大衣柜，对得起这黄波椤！

他说得很认真。当时，我并没有当回事，黄波椤很珍贵，但北大荒的老林子里有不少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只有红木做的大衣柜才是最珍贵的。

最后，他帮我打好了单开门的大衣柜，一个两头沉的写字台。剩余的边角料，他又打了一个小小的储物柜和一个床头柜。最后，他帮我把这两块木头的四件家具用油漆油好。他还特意强调说：“别用乱七八糟的颜料，就用清漆，黄波椤本身的木纹好看！”他说得那么认真，对待这四件家具，像对待自己要出嫁的闺女一样。

为表示感谢，完工后的那天晚上，我留下他吃饭，陪他喝了点儿北大荒酒。他连说这酒好喝，比二锅头好喝！然后，他指着大衣柜和写字台，对我说：“我敢保证，满北京城也难找到这样

一个用黄波椤做的大衣柜和写字台。你就可劲儿地使吧，一辈子也使不坏！”

大衣柜做好了，唯一的缺憾是没有配上镜子。那时的大衣柜一般讲究的是双开门和单开门。单开门，一边下面是几个抽屉，上面是一个柜子；另一边的门上则要有顶天立地的一整面镜子。这是那时大衣柜的标准样式，就像当时流行的蓝布中山服或绿军装一样。没有配上镜子，不怪木匠，那时，买镜子，要票。在票证的年代里，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要票，买棉花买布买家具，都需要票。没有想到，买镜子，还需要票。我没处找镜子票，只好让它虚席以待。大衣柜的一扇门上，没有镜子，空荡荡的，像张大豁牙子的嘴巴，不好看。

新婚的妻子，便用一块花布挂上面，暂且李代桃僵，替代镜子，虽照不见人影，花布上的花枝招展，也算是聊胜于无。

原想，不就是一块大衣柜的镜子吗？还能那么难买？不就是要一张镜子票吗？不见得那么难淘换吧？谁想到，就是那么难，一年多下来，竟然就是无法买到一块大衣柜的镜子。

这一年的冬天，春节前的一次北大荒

友聚会。

一个同在北大荒的北京知青，刚回北京，怎么那么巧，街道知青办分配工作，她被分在花市的一家玻璃店。聊天中，她听说我想买大衣柜的镜子，对我说：你找我呀！我说：你刚去上班，能行？我可是没镜子票呀！她笑道：不行，想办法呗！你听我的信儿吧！

我便开始等信儿。

1977年春天做好了大衣柜，1978年春

节结婚。一年之后，又一个春节过完了，又过了夏天和秋天，到了冬天，日子轮回，又快要过年了。还没有信儿，我忍不住给她打了个电话，问她大衣柜的镜子还有戏没戏了？她

说：怎么没戏了？等着你来买呢！我说：你不是让我等你的信儿吗？敢情我这是“傻老婆等茶饭”呢！她说：你可真够实诚的，你就不会主动找我来问问。说罢，她呵呵笑了起来。

挂上电话，我有点儿生气。

说好了，有信儿，她告诉我，我这足足等了有一年。看来不是自己的事，别人不会那么上心。心里暗想，还是跟她的关系一般，要是当年在北大荒搞过对象，哪怕只是悄悄的短暂一瞬的暗恋呢，情况肯定就不一样了。不能说是“世味年来薄似纱”，人情世故的亲疏远近，本来就是这样。“北大荒荒友”这种身份认同，不过如当今随处可见的名片一样，只是文字书写的符号，有些缥缈，不那么牢靠。

1984年，我搬离洋桥，房子留给弟弟

一家住。

一直到1990年初，洋桥地区拆迁，

代之而起一片高楼大厦。

新房子在一街之隔

的新楼区，这里的平房，这么快就没有了踪影，像电影里的空镜头切换。场景突变，犹如童话一般，阳光璀璨，鲜花盛开，音乐漫天响起。变革的时代，百废待兴，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和幅度，超出一般人的想象。搬家的时候，大衣柜、写字台和那小小的储物柜、床头柜，统统没有。曾经那么珍视的黄波椤，就这样被我弃之如履，换上了一套进口的罗马尼亚板式家具，那时候正流行。自以为紧跟上了潮流，现在回想，发现在那个瞬息万变的年代，很多东西随着人们的价值系统在变，而变化之快之大，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。这是潮流裹挟着人们，不由自主地在获得一些新东西的同时，失去一些旧东西，老北京话说的是：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不仅那时候，即使现在，不少人还是会以为旧的没有新的好，所谓唯新是举。我便是这样的人，潮流